

也談泰戈爾

(本文插圖刊第80頁)

●汪萊茵(旅美學人)

接觸西方精神物質

讀中外雜誌二九九期徐天淦「泰戈爾與中國」筆者也來談談紫禁城新發現泰戈爾留照，敬請中外讀者參閱指教。

遜清皇帝溥儀，在離開紫禁城前的這段時間裏，特別是在他成年之後，對外活動頻仍，時有一些洋人來訪，其中他與印度文豪、詩聖泰戈爾過從頗密，但鮮為人知，本文就他倆的交情作一介紹。

公元一九一九年經溥儀七叔載濤的好友李經邁(李鴻章之子)推薦，英國蘇格蘭人、牛津大學文學碩士雷金納德·弗萊明·約翰斯頓(即莊士敦，Rayimaid Fleming, Dahnstan)被聘為溥儀的英文師傅。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民國政府內務部派許寶衡，遜清皇室內務府派李鍾凱，與莊士敦正式訂立了聘請合同。據莊士敦在「紫禁城的黃昏」一書中回憶說：「我是公元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第一次打從神武門進入紫禁城的」。其時溥儀纔十三周歲，從此他除了接受傳統的封建教育外，世界在溥儀面前展開了新的角，他開始接受西方精神文明，並開始追求西方的物質文明。

隨着時間的推移，溥儀長大了並逐漸成熟起來，對紫禁城外的事物，他愈來愈感興趣。他極力爭脫遜清皇室所遵循的清代宮廷的陳規舊習，他追求新知識，瞭解新事物，他會晤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先生一事，即曾引起當時報界的極大轟動。

溥儀完全不反對外國人進入紫禁城，他常常很高興地去會見他們。莊士敦回憶說：「公元一九二二年和公元一九二四年之間，由我介紹而特准進入紫禁城的外國人也有好多次數」(「紫禁城的黃昏」)。筆者在整理研究考證清宮祕藏舊照片中，偶然發現幾幀印度詩聖泰戈爾在紫禁城後三宮所攝的照片和泰戈爾的其他照片，其中包括有泰戈爾和溥儀的合影、泰戈爾和鄭孝胥的合影，以及泰戈爾和顏惠慶等十二人的合影和泰氏頭部畫像照等共四幅。筆者帶着這四幀照片去向我國研究印度文學、研究泰戈爾的專家吳曉鈴請教，吳先生極為興奮，他告訴我他在印度參觀泰戈爾博物館，甚至在國內，均尚未見到過泰戈爾在紫禁城內的照片。

他認為：這是個極重要的發現，十分珍貴。此時恰逢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到大陸進行訪問，於公元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參觀北京故

宮博物院。筆者將上述三幅有關泰戈爾的合影照片，請北京故宮攝影組翻拍放大至十六吋，贈送給了印度客人。拉·甘地總理極有興趣地詢問照片上的其他人，並風趣地說：這是訪問的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

莊士敦回英國後撰寫的長篇回憶錄「紫禁城的黃昏」一書，公元一九三四年在倫敦出版，風靡歐洲，曾多次再版。公元一九八九年三月北京求實出版社出版了由陳時偉等譯、馬小軍校譯的中文本，他們是根據維克多·高蘭茲出版有限公司公元一九三四年版本譯出的，在這個版本裏刊出了溥儀和泰戈爾的合影一張，說明莊士敦把這張照片帶到了英國。

松竹梅留下三友圖

中國人十分熟悉和景仰印度偉大詩人、作家、哲學家、社會活動家和公元一九一三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生於公元一八六一年，卒於公元一九四一年)。泰戈爾曾負笈英倫，遊學歐美各國，對中國懷着友好情意。公元一九二四年泰戈爾應邀到中國作學術演講，到過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受到中國文化界、學術界的熱烈

歡迎，成爲中印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話。關於泰戈爾的來華活動，當時的報刊曾作過不少報道，「泰戈爾傳記」也有記載。印度的泰戈爾博物館內，至今尚保存並陳列有泰氏訪華的一些照片及其他實物。泰氏是於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由上海來北京講學的。北京的學者和文化界，曾在天壇草坪上舉行隆重的歡迎會。舉世聞名的天壇，雄偉雋麗，翠柏成行，綠草如氈。在這春意盎然的季節裏，年逾花甲的泰戈爾，由年輕的女詩人林徽因（後來與建築學家梁思成結婚）小姐攙扶，登臺發表演說。泰戈爾在北京各大學作學術演講時，均由新月派詩人徐志摩擔任翻譯。有人描述這次天壇集會時寫道：「林（徽因）小姐人艷如花，和老詩人（泰戈爾）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面，郊荒島瘦的徐志摩，有如蒼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圖。徐氏在翻譯泰戈爾的英語演說，用了中國語彙中最美的修辭，以硤石（浙江省地名，徐志摩家鄉）官話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詩，飛瀑流泉，淙淙可聽。」（吳詠「天壇史話」，轉引自陳從周「徐志摩年譜」）可見，當時的情景是多麼令人神往。

紫禁城接待泰戈爾

泰戈爾在北京訪問期間，經莊士敦介紹，認識了溥儀，並經溥儀特許進入紫禁城的後三宮內。他們會見時，溥儀和鄭孝胥分別與泰戈爾攝影留念。「紫禁城的黃昏」第二十一章「御花園的賓客」中記載：「這位著名人物於公元一九二四年曾拜見過皇帝。他就是拉賓德倫納特·泰戈爾

。受一個文學團體的邀請，他於四月份來到北京。這個團體包括學術界泰斗胡適博士、才華橫溢的青年詩人和「新月派」領袖徐志摩（幾年之後他不幸地悲慘死去）。泰戈爾到中國時，排外情緒在學校和一些學派中蔓延，這使他的來訪受到一些影響。他呼籲年輕的中國，要珍惜本民族高貴美好的文化遺產。這些話却受到一些學生聽衆的冷遇甚至敵意的反對。我期望泰戈爾在沒有充分認識中國這個從未使外國人抱憾的禮義之邦之前，不要急於離開北京。因此我向皇上談到了他，並要求允許帶他到紫禁城來。我也向皇上講了一些有關泰戈爾詩的英文和中文翻譯問題。這個請求馬上得到應允。在御花園我的亭閣（按：即養性齋）中的會見，肯定使皇上和詩人（我想象如此）都很愉快。」在莊士敦的介紹下，終於使年過花甲的泰戈爾和年輕的溥儀結下了一段忘年之交。

莊士敦在這本書裏接着說：「鄭孝胥是參加這次會見的人之一。我很高興地在皇上的主持下，把這兩個偉大國家的一流詩人介紹相識。思想的紐帶立即把他們緊緊地連結在一起。」

鄭孝胥（生於公元一八六〇年，卒於公元一九三八年），清末官至按察使，曾任清朝駐日本神戶總領事，辛亥革命後一直爲遜清皇室復辟活動效力。公元一九二四年三月三日，溥儀任命鄭孝胥爲小朝廷的「總理內務府大臣，佩帶內務府大臣印鑰，賞頭品頂戴，令其全權整頓內務府。」可是鄭孝胥祇幹了三個多月，於是年六月二十五日辭職，溥儀又命紹英接替這個職務（「遜清

皇室軼事」第一六八頁）。用莊士敦的話說，鄭孝胥是「內務府的第一位漢人總管」，他是在滿族上層的妒恨下被迫辭職的。鄭孝胥參加了溥儀和泰戈爾的會見，而且是以總理內務府大臣的身分陪見的。因爲泰戈爾進宮，恰好是在鄭孝胥任職期內。筆者發現的清宮祕藏照片中的溥儀和泰戈爾、泰戈爾和鄭孝胥的兩張合影，都是在同一天的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拍攝的，所取背景，所用光速幾乎毫無二致，其背景都是在御花園西部千秋亭東側的四神祠。

兩張刻意安排留影

溥儀與泰戈爾合影，溥儀站在左邊（按中國習俗左爲上，即照片上的右邊），泰戈爾則站在溥儀的右邊（即照片上的左邊）的位置上。泰氏站在比溥儀矮一級的石臺階上，這不知是出於對遜清皇帝的尊重，還是因爲泰氏的個兒比溥儀高出半頭的緣故，也許是攝影師的特別安排吧。而泰戈爾與鄭孝胥的合影，則詩哲泰戈爾居上（即左邊，照片上的右邊），位置恰好顛倒了過來，並一起站在四神祠前的石臺階階下拍攝的，似乎

是出於周密考慮的。

從這兩張雙人合影來看，那是北京的早春天氣，溥儀尚著薄薄的棉袍，四神祠房頂的瓦楞中間，依然能看到稀稀疏疏的越冬枯草和剛萌生不久的嫩草葉。其時，溥儀已大婚一年多。同年十一月四日，溥儀被馮玉祥趕出了紫禁城。

筆者同時發現的那張十二人的合影照，從背景房屋來看，顯然不是在皇宮之內，而是在莊士

敦的住處拍攝的。經過筆者的多方考證，除某女士不詳外，照片上的其餘十一位已全部查明出姓名身份。

前排(坐)：泰戈爾(左)、顏惠慶(右)，時任民國政府內閣總理。他本是清末留洋博士，宣統二年任清廷翰林，官外務部右參議，朝外人士呼之為洋翰林，西方人稱之為M. W. 顏博士。他出任內閣總理前是駐德公使；內閣總理謝職後曾任駐日內瓦國際聯盟的代表；三十年代又出任駐莫斯科公使。公元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溥儀大婚時，他在賀禮單上書的是「跪進」一詞，說明與溥儀的關係不一般)；

前排(站)：任薩姆(左)溥儀皇后婉容的英文師傅。據清宮檔案記載，公元一九二四一月遜清皇室內務府會規定婉容教師英格蘭木和馬修容每人月薪洋三百圓。在「紫禁城的黃昏」一書中，莊士敦則說：「皇后經常由伊莎貝爾·英格拉姆小姐伴陪。她是皇后的美國朋友。在皇后進宮之前和進宮之後，她一直是皇后的英語教師。」看來，清宮檔案中記載的任薩姆、英格蘭木和莊士敦所說的英格拉姆，其實是一個人。筆者也曾發現婉容的另一名外國女教師馬修容的照片，他並未在此照片中出現)、林徽因(右)；

中排(自左至右)：徐志摩(泰戈爾曾為之起個西洋名，稱Susima)、伽梨陀莎·那伽(Kalidasa Nag, 印度人)、恩厚N(Elmhurst, 英國農學家，徐志摩之友)、沈摩漢(Kstina ahan Sen, 印度梵學家，印度明院院長，明院即研究院)、潤麒(婉容弟弟，後來成為溥儀的

三妹夫)、難達婆(Nanda Lal Base, 印度畫院院長)；

後排(自左至右)：某女士(左，姓名尚不詳。據福州華南女子學院副院長、「林徽因詩選」和「林徽因作品選」的編者陳鍾英女士稱，她曾訪問過目前尚健在的林徽因之表姐王稚姚老太太，王老太太回憶當年她和她親姐姐王孟瑜經常參加新月社活動，王孟瑜參加過接待泰戈爾的活動。因此，陳鍾英認為此人可能就是王孟瑜女士。可是，筆者寫信給王稚姚的女兒李滢女士，並附去了該照片復印件，請她母親鑑定。王滢給筆者回信說，她母親回憶當年和王孟瑜姊妹倆均未戴帽的裝飾，王稚姚老太太鑒定不出此人是誰。筆者則認為該女士穿著低胸的洋服、戴着西式帽子，極可能是個外國女子)、莊士敦(右)。

這張十二人合影可以斷定是在莊士敦的住處拍攝的，因為從在倫敦出版的「紫禁城的黃昏」一書內所登載的延恩侯在莊士敦住處拍攝的照片來看，二者背景房子是一模一樣的。據莊士敦自己說，公元一九二四年他在景山北邊有個家，同時溥儀准許他在御花園養性齋內安了個家，必要時可在宮內留宿。

照片上的這個家就是景山北邊的家。「紫禁城的黃昏」記載說，公元一九二四年九月七日下午，延恩侯到景山北邊的家中，拜訪了莊士敦。因為延恩侯是朱煜勳的封號，為明皇族後裔，字炳南。後來莊士敦派人送給朱炳南一張當時會晤時一起照的合影。該書發表的朱炳南單人照就是這次會面的記念像之一。

忘年之交情意拳拳

這幀十二人合影上沒有溥儀，但照片是在北京故宮內發現的，顯然是由溥儀保存的。不難看出，泰戈爾雖在北京逗留的時間很短，但他和溥儀的情誼交往不止一次。因為照片上不僅有溥儀的英文師傅莊士敦，還出現皇后婉容的英文師傅任薩姆，以及溥儀在宮內伴讀的婉容弟弟潤麒。由此證明泰戈爾不祇來過故宮，作為溥儀的座上客，而且溥儀也派人去拜訪過泰戈爾，兩人的交誼當然不一般，這是他們當年活動的真實寫照。

與此同時，筆者還在故宮發現了某外國畫家為泰戈爾繪的素描畫像的翻拍照片，畫像的右下方有畫家的簽名款，由於是翻拍照片而辨認不清畫家的姓名，尚能依稀地看出注有「一九二四」和英文「Peking」(北京)字樣。這說明溥儀是將此畫像照片為與泰戈爾的交往紀念品留下來的。所有迹象都表明泰戈爾與溥儀情誼殷殷。

中印兩國人民的友好情誼源遠流長，這批泰戈爾於公元一九二四年在北京紫禁城活動的照片的發現，為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為研究中英文化關係史，為研究泰戈爾，為研究莊士敦，為研究溥儀，留下了難得的實物形像資料。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
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即可收到書刊。